

百年风雨家国情

——读《袁宝华回忆录》随感

(上接第一版)但我们应该记住自己是怎么从挨打中站起来,又怎么从落后中再崛起的,剩勇奋斗继续前行;记住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等史训,走“富不骄,强不霸”之路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纪念碑就立在樱桃沟。

(二)

现年60岁以上的人,大概大多数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大跃进”带来的“饥饿”、“大革命”带来的“内乱”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当然因地域、环境、地位不同,各人有不同的感受。《回忆录》叙述了东北解放后东北工业恢复、发展中如何“出产品、出经验、出干部”,以及新中国工业如何稳健的起步;叙述了袁、吕等1952年随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我国“一五”计划苏联援助项目、日夜加班工作的具体情况。在讲到“156项工程”项目时,我立马想到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“沈阳黎明公司”是156个之一。那是边学边干,付出辛劳就有收获的岁月。其时袁宝华是冶金部领导,他详述了“指标”如何一次次飙升,主观意志如何不可阻挡。结果是“全民大炼钢铁”,用饭锅当废钢,以木材代焦炭,丰收年份的粮食留在地里,各种“卫星”套红印在报纸上。袁的家乡是河南省南召县,“当时《冶金报》报道这个县日产1000吨铁,我大吃一惊,‘大跃进’把我家乡伏牛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。”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,1958年就“跃进”到1108万吨(计划1070万吨),报喜的背后是不能用的废钢占了一半。我那时在初中读书,学校操场上垒起小土炉,师生们留着汗水、打着瞌睡炼出的几吨渣钢,应该也在千万吨钢中占有一份。

袁宝华在书中从工作角度概括的是:“1958年是难忘的一年,1959年是难堪的一年,而1960年则是最难受的一年”。接下来是“过渡时期”,实际上是“饿肚时期”。“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,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。”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,邓子恢主张在农村搞承包,受到大会公开批评时,“脸色煞白,一句话也不说”。《回忆录》里对高层不同意见的回忆,对基层人民疾苦的描述,字里行间里透出深沉、无奈的“家国情”。

中华民族具有自纠、自愈功能,若此才有延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,我们党也有这个传统。“纠”与“愈”的过程也充满了斗争和伤痛。

1961年,国家对经济发展终于确定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知道这是针对“大跃进”“饿肚子”等问题提出来的,人们“菜色”的脸上有了“喜色”。看了《回忆录》“对国民经济伤筋动骨的调整”一节,方知看似简单的这八个字,其由来、变化,颇耐人寻味。1960年8月计委提的方案是“整顿、巩固、提高”,国务院会上,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知道“提高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,于是把“整顿”改为“调整”,避开“整顿”这个分量较重的词,还加上了“充实”二字。这样的更改,在头脑发热岁月刚刚过去的时势下,更为上下所接受。实际工作之难,袁宝华称之为“伤筋动

骨”,不是“调整”二字体现得了的。

经过三年调整,国民经济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,重要的还有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。到1965年,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,吕东是冶金部部长,很快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,以致蒙冤入狱,家破妻亡,被关在秦城监狱四年多,直至林彪出逃后才恢复工作。胡昭衡时任天津市市长,被诬为“三反分子”,受折磨最厉害,身心俱损。袁宝华是相对幸运的部级干部,时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部部长,开始也被诬为“叛徒、特务”,但很快查证造反派列举的才是“假材料”。“靠边站”一年半后,在周恩来干预下解放出来,参加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的计委生产组组长。

令我不只是理解、同情还加上敬重的是袁宝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中九年的艰辛工作。《回忆录》有一段情深意切的自述:“在那极其困难的年代,我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的运行,负责工业交通生产、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工作。在工作过程中,亲眼看到并深刻体会到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,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‘左’倾错误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经过。我深感有责任把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写出来,把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。”经济形势怎样的极其困难?斗争怎样的艰难曲折?书中均有详细的叙述,我也难摘其要。袁宝华写道: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,工厂没有完全停工,铁路尚能运输,国民经济尚能维持运转,是生产组起了‘救火队’的作用。那个时候搞生产的人也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,许多领导干部随时有被揪斗的危险,而且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,组织生产调度也十分困难,生产组能够顶住各种干扰,也是靠周总理保护。”连为群众生计、“闹革命”之需而抓生产的干部都需要保护,可见周恩来总理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集万难、托众望于一身的国之栋梁,正是他的领导艺术、斗争策略,以及袁宝华这样干部和群众的给力,才维系了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。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!

(三)

1982年成立新经委的主要办公地址“九号院”,也是吕东、袁宝华、胡昭衡三位老同学、老战友“分离”40多年“重聚”的地方。我称自己在九号院这一段工作是“如歌的岁月”,我想对他们更是平添一份人情谊。

1937年,他们三人从北大各赴东西之后,吕与袁相见较早,是在1949年的沈阳市。袁从延安辗转转到沈阳,不久调入东北工业部。在此之前,即东北解放之初,吕就随大批干部进入东北,在晋察冀做经济工作的吕这时是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,袁到后任计划处处长(朱镕基、林宗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该处工作)。《怀念》中袁说:“在东北工业部3年,是我学习做经济工作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,吕东同志好学好学精神对我启发很大、影响很大,感受很深。”1956年冶金部成立后,吕是第一副部长(1964年任部长),袁先后任办公厅主任、副部长。1960

年袁调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局第一副局长。从沈阳到北京的这一段,吕与袁共事长达11年。胡昭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,并在这个岗位上办了离休手续。

新经委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兼主任,吕与袁都是副主任、副书记,主持日常工作。后来,吕接任主任,袁是第一副主任。胡被聘为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,经常列席经委会议。这三位老同学、老战友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于九号院重聚,欣喜之情可想而知,共同的信念与工作岗位,让他们又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。《怀念》里袁讲到吕:“由于我们的老关系,我又是老经委,他对我的意见非常尊重,我们合作得很好。吕东同志遇事谨慎,深思熟虑,百无一失,又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,和他共事,心情总是愉快的。”称之为“我的良师益友”。讲到胡:“岁月不居,相知弥深”,不仅交流工作,还互勉诗词,是“同志加挚友”。我第一次见到吕东,是在他任航空部部长,他视察沈阳黎明公司,我在公司参与接待的时候。后来我在航空部、机械委一直在他领导、关心下工作。第一次见到袁和胡都是在九号院的吕东办公室,记得见袁时,几分钟闲话中有两句:“我们还是校友啊!”“大跃进吹牛皮,贵省(安徽)是冠军,我们省(河南)是亚军”,一下子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。后来几年里,我因为做办公厅工作,在九号院经常与三老见面,他们勇于开拓、严谨乐观、高瞻远瞩、关爱干部的精神,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扶持、诚于切磋的友情,给我很深的印象,多有熏陶与教益。

1982—1988年的经委正处在我国经济整顿恢复,探求工业发展新方向、新途径的重要时期,工作紧张多头、斑斓多彩,《回忆录》里有生动具体的记叙,并说“为当好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参谋部,作出了非凡的贡献。”我的拙著有关章节中也有简述,不再重复。但如今社会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前10年没做什么事,这显然是少知而偏颇。应知“万事开头难”,应知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动人的故事。经委系统工作也只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方面军。仅就打开眼界来说,且不细说袁宝华讲到1978年前后奉中央领导指示带队“走出去”访问七八个发达国家,并在日本“蹲点”一个月的新收获、新作用,这里先举个我的小例子:九号院的八十年代初,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负责人被“请进来”在南会议室讲课,我耐心听后脑洞大开,原以为证券只是股票、债券,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名堂,虽然顶多是“知其然”;还没想到的是,在讲完课后还主动让听者“提问”,沉默少许有人好奇地问负责人和同台日本翻译工资多少,回答后补了一句:我交完个人所得税,和他(指翻译)差不了多少。大家才知道,日本所得税率“累进”得够厉害。

1988年国家机构改革计委、经委合并成立新计委之后,吕袁胡三位领导已年过70岁,均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袁宝华在1979年初就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—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,最先提出“自治、自立、自养”的建设原则,后改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(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署办公)。吕东退下后,创建了中国

工业经济协会,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。胡昭衡创建了北京杂文学会。这些社会经济团体的工作,也都是改革开放中开创性事业。我荣幸地是这三个会的兼职副会长,前两会的副会长我兼了20多年,并兼中企联旗下《企业管理》杂志的主编数年。这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做事,包括从中企联的继任领导陈锦华、王忠禹,工经联的继任领导林宗棠、李毅中等那里学习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,对我以后做协会工作大有裨益。

(四)

2015年5月23日,在春风沐浴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,聚集了100多人,参加“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”,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主持,百岁高龄的袁宝华专程出席。会上,传达了习近平办公室转达的总书记对袁老百岁和座谈会的祝贺,朱镕基、顾秀莲、陈锦华等原国家领导人,现任副总理马凯等出席,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。大家欢聚一堂,庆祝袁老百岁华诞和他系列著作出版。朱镕基在讲话中称袁“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”,顾秀莲说袁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”,马凯的《七绝》献诗:“百年长卷尽斑斓,戎马兴邦三百篇;更有李桃花竞放,同期茶寿仰高山”,简练地描述了袁老百年精彩人生,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,似可代表大家的心声。

这个特殊的座谈会,也是一次友谊、友情的交流会,王忠禹在小结时就说“大家的发言充满了感情、尊重和友谊”。与会者都是与袁宝华工作、生活关系密切的人,大多数已年过古稀。我也是参会者之一,也为会上的气氛所感染,不由得想起袁老80岁生日时曾自赋诗《八十述怀》,彼时和者甚多,我写的四句学习感言也被收入和诗集中,最后一句就是“相期再庆百年春”。也不由得想起袁老的老同学、老战友吕东、胡昭衡,吕老去世后我曾写怀念文章《忠厚长者勤政楷模》,胡老去世后我曾写纪念文章《要做真的人》(在北京杂文学会纪念胡老会上宣读,题目为胡老诗中一句)。当然,我尊重的老领导很多,对我成长的帮助很大,都难以忘怀,只因吕袁胡三位相互是老同学、老战友,吕袁是我人生受教得益最长的直接领导,胡是我写作杂文的引路人,我又高攀他们是老校友,故而籍读《回忆录》之机,三人联系忆谈写此一文。

人生之路既短又长。从樱桃沟到九号院46年,从九号院到芳菲苑33年,袁宝华今年已104岁矣!2019年春节前两天,我又一次去拜望袁老,轻抚老人家历经沧桑的双手,往事历历,感慨不已:“一二·九”运动那样的革命斗争不能忘,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新篇不能忘,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。美好生活、富强中国是赋有家国情怀为主流的一代代人奋斗出来的,美好生活中应该包涵友谊、友情,奋斗过程中建立的友谊、友情更是弥足珍贵。

